



复旦文史专刊之六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民族认同与 历史意识：

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旦文史专刊之六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 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3.5

(复旦文史专刊)

ISBN 978 - 7 - 101 - 09305 - 6

I.民… II.复… III.①民族学—研究—中国②民族学—研究—日本③史学—研究—中国④史学—研究—日本 IV.①C955.2②C955.313③K092④K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075385 号

-
- | | |
|-------|---|
| 书 名 | 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 |
| 编 者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 执行编者 | 张佳佳 王鑫磊 |
| 丛 书 名 | 复旦文史专刊 |
| 责任编辑 | 胡 珂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
| |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
| |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400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305 - 6 |
| 定 价 | 66.00 元 |
-

序

本书是2009年12月14日至17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History,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in Modern East Asia: Interrogating History and Modernity in Japan and China)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

这次国际研讨会，从会议主题到与会人选，其实都是由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提议的，之所以把“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当作主题，也与施耐德教授的研究兴趣有关。施耐德教授长期研究现代中国史学，特别注意的就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追求历史真实和寻求民族认同的关系，从他的已经译为中文的著作《真理与历史》的书名中，你就可以看出，在“道”和“史”之间(相对“真理与历史”，我更喜欢“道史之间”这一翻译)，其实是有无尽冲突的。中国过去几十年中，总是在争论历史研究应该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其实“论”和“史”，也是有冲突的，只是在过去的观念中，似乎“论”和“史”被当作可以协调或化解的问题，似乎只要有正确的主义(或理论和方法)，总能轻易地找出一个在夹缝中前行的正确途径。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是非和真伪往往不一致，且不说常常有政治压力，就算没有政治力介入，寻求认同的历史观念和寻求真实的历史考证之间，也会有乖离的时候。举一个例子，可能受到白鸟库吉影响而提倡“疑古”的顾颉刚，曾经因为瓦解古史而被人斥为“动摇国本”，这个时候“真伪”是第一顺位的选择，但在抗战方殷之际，为了寻求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反击日本学界瓦解中国整体性的企图，却可以转为暂时放弃“疑古”，批判和他同道的日本同行，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念下，以是非大义为第一选择，渐渐不提“疑古”而转为追求共同历史源头和寻找民族认同资源。回顾现代，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

学世界中,重视史料还是重视观念,偏重论述还是偏重考证,为政治为国家还是为科学为客观,为民族认同还是为历史真实,始终是一个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施耐德教授建议当时他所在的荷兰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Leiden University, Modern 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与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Fud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合作,举办一个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会。稍后,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研究中心(Tokyo University, Centre for Philosophy)也加入了合作举办的队伍,这让我们俩更加高兴,由于他和我都始终关注东亚领域,也特别关心近百年来中日学术史,因为正是在一百多年里,由于鸦片战争、黑船事件、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中国和日本不仅在政治上发生了大变化,而且学术上也发生了大变化。面对西方,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在追随西方文明和保存东方文化之间,在适应现代观念与建立国家历史之间,都在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思路和方法,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学,为了建设各自的近代国家与民族认同,在对日本和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进行描述的时候,尤其呈现出各自的立场、思路和方法的差异。这是一个有趣的、不同的、可资比较的过程,所以我们把关于“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的话题从中国扩大日本,这就有了会议的副题“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

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论文中,读者可以看到不断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比如“东亚”、“现代性”、“语言概念”、“典范方法”、“晚清民初”或“明治大正”、“历史叙述”等等,其实始终围绕的仍然是“认同”和“历史”的问题。当然,会议不是学术灵药,它只是一个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种论述被端了出来,但话题、角度、意旨可能仍然分歧。好在出席会议的加拿大、美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日本、澳洲、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都相当敏锐地为我们思考这个“道史之间”的永恒话题提出自己的观念,奉献各自的角度。也许,启迪思考和提供资源,永远是人文学术的意义所在。



2012年8月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1)
东亚:时间与历史的界定	Stefan Tanaka(1)
国体:“牧领”和民族自觉	酒井直树(20)
内藤湖南的史学:如何摆脱对“统”的追求	中岛隆博(43)
福泽谕吉与宫崎滔天: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中一对怪异组合 的黑白像	Christian Uhl(52)
为何“Mr. Science”的中文叫“科学”? ——挽救中国史上 的格致学,1750—1925	艾尔曼(78)
“言”和“文”的“真理”表述——章太炎的语言实践,或者哲学话 语方式	石井刚(96)
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李孝迁(115)
“历史的意义”:略论晚清中国对“历史”的认知和阅读	章 清(136)
典范与方法:侯外庐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彭国翔(164)
文化民族主义与东亚现代性:寻找当代儒学的跨文化 视野	何乏笔(Fabian Heubel)(175)
中国农民的再想象:关于大跃进的历史叙事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 Schwiedrzik)(185)
日本战后民众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孙 歌(202)

重写中国近代史: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对现代性的回应

..... Elsvan Dongen(213)

历史创伤、知识分子政治转向与主体一致性——吉本隆明的“1945

年情结” Rikki Kersten(226)

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 孙英刚(246)

东亚的未来(1937—1945):“大东亚”概念对中日关系的重新

审视 U. Matthias Zachmann(264)

边关何处? ——19、20 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学的兴起及其

背景 葛兆光(280)

章太炎在明治佛教哲学语境下的庄子式平等观

..... 慕唯仁(Viren Murthy)(292)

东亚：时间与历史的界定

Stefan Tanaka*

时间就是一切，人无足轻重；人充其量只是时间的化身。

——Karl Marx

人们大概已经注意到，对“时间”的探究，是进行一场迟来已久的大扫除的最佳起点。当某种能够为其所在社会指引基本方向之思想传统——正如自(所谓)文艺复兴以来的我们的传统——走过了数个世纪的历程之后，就有必要来一场大扫除了。

——Norbet Elias^①

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甚至可以追溯更久)，我们看到了很多对现代性的有力批评。但我们并不能肯定，对这个国际的、全球的世界的认识比过去更多、更好。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国好像仍然是以一种东方主义的、或者委婉一点说是进化论的框架来定义其所从事的几场战争。日本的外交政策好像已冰封于五十多年前建立的冷战框架中，许多颇有影响的人的思想状态甚至更加接近于二战之前。此外，我们似乎缺乏改变的能力，尤其是在面对新的情况，例如“东方”回击西方、或者长期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时。简而言之，我们甚至比过去更加沉浸于现代性的认识论中，它在颂扬进步的同时，却致力于让停滞结构化。更进一步，从此次在东亚召开的有

* 作者单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译者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唐勉嘉、范佳妮。

① *Time: An Essay*, (Blackwell, 1992), p. 93—94.

关东亚之会议的立场上,我们有必要问一句:是否现代性本身正是建立于一个落后的亚洲之上?

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线性时间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在现代社会中,时间是如此的自然,以至我们忽视了它是如此深厚地支配着我们生活与学术。我们理解时间的具体方式是历史性的^①;今天(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考虑时间的方式植根于自17、18世纪产生的时间观念,它非常深刻地受到牛顿著作的影响。在众多批评现代西方社会的研究,都没有考虑时间^②。日本历史上,1872年改历——从阴历改成阳历(格利高里历)与24小时制的采用——只有在讨论19世纪70年代改造日本列岛的许多重要而激进的政策的书书中才会提及^③。对现代性的研究,最近才开始探究时间,以及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的各种时间框架的历史性。应该把它们和那些常常把时间与空间视为历史/发展/进步与民族/文化之同义词的讨论区别开来。后者极少考虑到时间和空间——以及支撑这些时间形式的各种概念形式——的历史性。历史学家必须去接受,时间流逝的形式有很多种,因此时间并不是外在的,而是一种衡量的尺度。S. A. Diddams等物理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尽管‘时间’极其重要,但它也只是用于描述动态、或运动过程的一种带有随意性的参数。”^④简而言之,因为它是一种尺度,我们也必须思考,我们阐释时间的各种概念形式,例如历史,也都是衡量尺度。

今天的历史是建立在绝对时间——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古典时间——之上的。当古典时间被用于现代社会时,它被认为是同质的、无意义的、统一的、自然的、进步的,等等;这是一种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连续的状态。这一绝对时间,正是康德、黑格尔等人用于发展其影响深远的哲学的时间;是充当了我们的各种制度、各种知识形式,乃至各个现代社会之基础的时间;是在19、20世纪内扩展到全世界的时间;还是曾经(并仍然)扮演了全球统一——即19和20世纪的国际化与当下的全球化之基础的时间。所有的现代社会,都必须经

① 直到17世纪,针对不同的对象,欧洲一直使用两种普遍性纪时标准:罗马的建立和基督的诞生。1650年,Bishop Ussher将上帝的创世定在儒略历710年10月22日(公元前4004年)。到了17世纪晚期,使用B. C/A. D来记录绝对时间的纪时系统变得普遍起来。在欧洲,这一纪时形式转变的最杰出的研究之一,是Donald J. Wilcox, *The Measure of Times Pa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特别是第七章。

② Peter Osborn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the Avant - Garde* (Verso, 1995)。

③ 关于这个变化的描述,参见拙作 *New Times in Modern Japan* (Princeton, 2004)。

④ S. A. Diddams, JC Bergquist, SR Jefferts, CW Oates, “Standards of Time and Frequency at the Outset of the 21st Century,” in *Science*, 306(2004):1318。

历走向这一线性、同质时间的转变^①。这种新的时间割断了现存的知识与习俗,影响了人们对各种关系的理解,改变了人类活动的各种模式,也重塑了人类活动被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

我对古典经典时间的不满源于这样一种意识,即:虽然我们能够探讨许多社会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何没有变成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即:变得像我们这样),但却常常诧异地发现,我们所开的那些处方是不成功的。我不能肯定我们是否理解了各种社会是如何变迁的。虽然时间是动态的,但我们是在用诸多静态的、会使过程固化的范畴来谈论各个时代。我的疑问是,我们对于线性——进步、发展、历史——的接受,使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线性公式本身所导致的诸多病症,也意识不到我们总是如此轻易地接受“新的就是更好的”。Michel Serres 相当刻薄地说道:“我们总是断定自己是对的,因为一个简单、幼稚、毫无头脑的理由——我们生活在当下。”^②简单地讲,尽管我们深信不疑地以为,我们现代的基础是一种宣称渴望并推动变化与进步的认识论;但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各种结构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这些运动。

关于现代性, Henri Lefebvre 所作的运动与停滞的对照,是思考这一问题的绝佳路径^③。运动是现代性的根本条件之一;确实,用康德的话来说,“自由”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是一种脱离过去(静止)的运动。在我们的现代体系中,运动只有在一系列的抽象(停滞)中才是可能的。这些抽象,积极地来看是界定了具体意义并确立了各种互动的关联纽带;但从消极方面看,这种抽象本身就是把运动束缚于概念结构本身之内。某种意义上说,这难道不是一种“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么?

在我们探究历史与亚洲、民族及其衍生品——认同、主体性等的关系时,应该承认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现代的历史理解本身。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将日本(和亚洲)带入国际世界的那些条件,在多大的程度上把日本困在了 19 世纪晚期确立的那种状态之中。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集中关注两个议题。第一,我将探究在国际的(或全球的)范围内,线性究竟促成了运动还是静止。Alfred North Whitehead 在早年探究自然与知识时,就曾经设问:在古

① 例如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trans. by Keith Tribe (MIT Press, 1985), 和 Michel de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 by Tom Conle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Michel Serres with Bruno Latour, *Conversation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Time*. translated by Roxanne Lapidu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 48.

③ Henri Lefebvre, “What is Modernity?” in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rans. by John Moore (Verso, 1995), pp. 189—195, esp. 190—191.

典的牛顿体系下描述运动是否可能^①。其次是由日益高涨的、要将历史作为一种区分手段(历史学科的一个主要任务)的呼声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即:历史是否不仅未曾充当生活的基础,反而更多地把生活束缚在了各种抽象范畴之中?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对历史中的时间的更加历史性(和多样性)理解的探讨。如果我们要理解存今日世界中所存在的多样性、理解各种观念与结构所推动和强加的那些权力关系,那么就有必要认识到,我们所活动于其中的,是一个同时主导了我们的(学术)世界和研究对象的时间框架。我们仍然活动于这个构筑了整个国际世界与我们自身的时间形式中。

时间的问题

我们当今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乃是神话性的。我并不是说神话就是错的,但用 Joseph Mali 话说,神话只是“融入、因而化成了历史的故事”^②。众所周知,一种单线的时间框架在 19 世纪被欧洲历史学家们采纳了,它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时间乃是“无意义的”和“同质的”^③。John Toews 最近揭示出,这种新的、历史的思考方式是如何在 19 世纪(30 年代)同时造就了一种一元认同(德意志)和对世界的历史性理解。Alfred North Whitehead 称之为“历史革命(historical revolt)”^④。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 19 世纪初的思维转型称为一种新的、或者“虚拟的”实在。

有趣的是,正当作为外在的绝对时间,为各独立社会的联系、为世界的统一奠定基础、并充当着现代学科之基石的时候,物理学迈向了一种全新的时间形式:爱因斯坦发现,同时性(simultaneity)始终依赖于参照系。这带来了一种新观念——时间是离散的、相对的。但在物理学迈向狭义相对论时,历史学仍然滞留于古典时间之中^⑤。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及区域研究仍然在古典的(有些人会称为“过时”的)时间框架内运作,并将之作为基础来构想、组织与评

①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1919]).

② *Myt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 xii. 另一本对我理解神话有重要作用的是 Michael Blumenberg, *Work on Myth*, trans. by Robert M. Wallace (MIT Press, 1985).

③ 是 Benedict Anderson 让这些词汇流行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先导意义。参见他的 *Imagined Communities* (Verso, 1983)。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和 Koselleck, *Futures Past* 是两部展现历史之历史性的杰出研究。

④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Free Press, 1967[1925]), p. 43.

⑤ 可参见 Wilcox, *The Measure of Times Past* 和 Peter Galison, *Einstein's Clocks and Poincaré's Maps* (WW Norton, 2003).

论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由于在古典时间下运作,我们这些学科仍然处在这样一种概念框架下——概念框架创造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本身。

我们拒绝用 20 世纪的、爱因斯坦式的时间观念来理解各种社会,就好比是在主张地球是平的。这让人会想起 20 世纪初有关同时性的争论。Peter Galison 对 Henri Poincare 和爱因斯坦做了极为精彩的对比:两人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研究同时性问题。当然爱因斯坦家喻户晓,而 Poincare 则不是那么有名,尚待历史学家来重新发现。不过,Poincare 的“错误”使他与历史学科——更广泛地说是人文、社会学科(正是在这个世纪之交这些专业学科开始形成)——更加接近。他相信进步、相信古典物理学,并且深信只要人们能揭示出人类在理解同一领域时的诸种错误,就可以实现全球的同步;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不一样的物理学观念。

Poincare 可并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和 Poincare 的状态一样,我们(历史学)可能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即靠着不断地寻找错误,以求达到对真相——可以按照时间向量来叙述的真相——的更加完美的认识。它支撑了思想的好奇心和整座学术大厦(包括我们的工作与升迁),并成为各民族—国家、国际乃至全球的基础。我们默认了一种对时间不作任何严肃探究的立场;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立场的诸多局限。这种局限性的后果,Peter Hughes 在他的论文《时间的遗迹》中写道:“任何由因果关系所支配的叙事,最终都会沦为彻底的侦探小说或宣传手册。这两者,要么是并未回答的问题、要么是未经质疑的答案,但总之都偏爱一种相对简单的解决方案,并抹杀、削弱了时序性与同时性的交融。”^①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这种默认立场的诸多局限——这是 Whitehead 提出“具体性错置的谬论(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基本根据^②。

古典时间与国际

许多学者指出,世界的同步与 19、20 世纪的帝国主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牛顿主义的时间与空间对 19 世纪的全球体系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作用。D. Graham Burnett 把 20 世纪初的世界称为一幅“文化地质年代的图景(geochronocultural tableau)”。他还指出,这一幅时间全球图的形成是 19 世

① Peter Hughes, “Ruins of Time: Estranging History and Ethnology in the Enlightenment and After,” in Diane Owen Hughes and Thomas R. Trautmann ed; *Time: Histories and Ethnolog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 276.

②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p. 51—55.

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事件^①。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确定,到太平洋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划定(从而把欧洲/美国确定为西方,而亚洲定为东方),再到各个社会围绕机械性时间的重组(现代的传播),可以说统一时间的成立是一场权力行为^②。长期以来,我们给这幅时间图景的各组成部分贴上了各种标签,诸如发展主义、第三世界、东方主义、原始,等等。这些时间形式是世界围绕均质性的进步时间而同步化的基本要素;同时,这一进步时间也把一切嵌入了它的序列之中,从而把它们区分开来^③。这正是两个世纪之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已经绘出的那种世界历史。要知道,黑格尔正是从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开始他的工作的。他写道:“在一般上说来,历史就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正如自然乃是观念在空间里的发展一样。”^④

从古典时间(即我们的现代)的观点看,这一世界的同步显得非常简单;但若承认时间亦有历史性,则此种同步又是非常深刻的。明治日本的情况很好地诠释了各个社会所经历的断裂。我将从1873年日本采用格里高利历开始谈起;这一纪年方式依据的正是一种单线的尺度——基督世纪和二十四小时制。1872年的太政官改历布告显示了这一行为表面上的简单性:

(太阴历)率属荒诞无稽,有妨人智之开达。而太阳历依太阳之躔度推算月份,虽每月天数少有差异,然季候早晚并无波动,每四年方置闰一日,至七千余年之误差不过一日,其精确远胜于太阴历,其便与不便,故不俟论而后定。^⑤

在政府看来,此种时间的规律是自然的,是超历史的。它仅仅是改用一种更加精确、更可预测的纪时体系。对19世纪的日本来说,引入这一外在时间,象征着一个为现代性目标而调适的际遇,一个参与的际遇,以及拒绝失败与屈服的需要。然而,要获得/强加广泛接受的难度,也暗示出变化的深度与广度;它“不自然地”改变了生活。1946年,一项有关历法使用和新年节庆的调查显示,农村地区37.6%的人过阴历新年,48.8%的人同时过两种新年,而城市中

① D. Graham Burnett, "Mapping Time," *Daedalus*, 132.2 (Spring 2003): 8.

② 1884年世界子午线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英国与美国的联合,压倒了法国要求把子午线画在巴黎的企图。

③ Osborne, *The Politics of Time*.

④ Geor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by J. Sibree, (New York: Dover, 1956), p. 72.

⑤ 引自拙著 *New Times in Moder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

则有 93% 的人过阳历新年^①。换句话说,在七十年之后,仍有超过一半的日本人口在使用阴历。然而,如果我们接受那种“惟有阳历才是自然”的观念,那么仍然使用阴历的那些人就成为了无知、落后、迷信和保守的了。

这引出了改用普遍时间的另一个层面:它既是供主体(民族—国家)在其中组织自身生活的框架,也是主体自身之存在得以证明的过程。Donald Wilcox 是这样描述黑格尔的历史的:“时间是实在的、客观的,不仅仅因为它构成了一个框架,可供主体在其中组织其可能的经验;时间是实在的,还因为它是主体赖以展示其自身实在性的过程。”^②一边是线性时间把一切融入了同一个体系,但另一边则是结构通过变异——线性系统下的不完善性的程度——来作出区分。换句话说,这一均质化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各个共同体在一个抽象单位——“民族国家”内的重新定位^③。这种地区的重构是现代性,即运动与停滞之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回到 19 世纪的日本,众所周知,新时间打碎了旧世界,所有知识与实践的传承都被动摇了。维新人士的代表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之概略》中展现了这一断裂的深度。在试图把日本历史与普遍史同步的时候,福泽发现日本的过去是 2500 年的停滞^④。这和黑格尔对东方的论述如出一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群岛没有过去,但“过去”和“历史”并不是一回事。要造出一个历史,至少需要两项行动:把为数众多的共同体重构为一个日本,和把过去重述为“已经死亡的过去(a dead past)”。死亡过去中的各种沉寂的对象,现在离开了旧的意义点、并被按照时间规则组织起来。这样就有可能在“日本”这个全新地区的数据集中,对所有事件进行重新定位。民族国家于是成为这样一种全新概念:它既“组织了可能的经验”,又通过如此组织起来的数据集“展示了[日本]的实在性”。简言之,众多异质的共同体被联合为一个单一实体(一

① 冈田芳朗:《日本の暦》(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第381,383页。

② Wilcox, *The Measure of Times Past*, p. 36

③ 许多学者认为民族国家乃是 19 世纪的制度,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但是,这种理解并未引起对历史自身的反思,似乎我们只是在重复黑格尔。Charles Taylor 指出,黑格尔认识到了民族国家的诞生,却低估了民族国家超越空间(传统与习俗)的潜力。Taylor 写道:“然而似乎很清楚的是,首先这个均质化过程扫除了所有传统的认同基础和 Sittlichkeit 的传统模式;其次,由此造成的真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常导致分裂与破坏的民族国家认同所填充。” 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3.

④ 有关研究普遍历史与国家兴起之间关联的佳作,可以参看 Christopher L. Hill,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World of Nations* (Duke, 2008).

个“日本”的实体),并被投射到绝对空间的网格上;这个绝对空间提供了沿线性路径(进步的时间)运动的向导,而这条线性路径则实现了内部时间与世界时间的同步化,并把变化描述为发展。

下一步就是要用一个“历史的”过去来推广“日本”的观念。但这件事确实知易行难;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产生能够被我们承认为“历史”的日本编年史^①。明治知识分子的最初努力,和早期那种试图通过追溯先例来使新主权合法化的编年史并无太大区别。1869年,为纂修“新日本”的历史而设立了国史校正局,其首要任务就是编写迄至14世纪幕府形成时的历史。

断断续续之中,这个机构开始建立日本的档案。它在整个群岛搜集资料,把各地方的文件抽调来编入档案,并且按照年代进行仔细检阅。很突然地,时间而非地域,成为了组织文档和衡量文档价值的标准。那些名人名事的价值,现在不再取决于它们的榜样意义,而是取决于日期所确定的“真实性”。例如,《太平记》曾经是记载过去的权威材料之一,它的可信度和准确性是19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历史争论之一。作为史馆主导者的重野安绎,通过对比各种记载,发现了日期上的差异,并由此质疑后醍醐天皇的忠实家臣儿岛高德是否存在,还指出有关楠木正成的许多事件是不准确的。简而言之,那些有关忠诚、典范的故事曾经被视为事实,现在年代学成了揭穿假面具的方法。对重野来说,在他把那些英雄榜样的叙事重组进日本的历史时,编年的时间乃是一种自然尺度。在颇有成就的历史重构过程中,框架组织起了过往的经验,并展示出日本的真实性;有关《太平记》的讨论也是这一过程的环节之一。现在《太平记》已被归入文学而非历史。

新历史的力量在于确定性和进化秩序,以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似乎无比地秩序化。这可不是一道简单的习题;地方叙事在民族框架中的重组,改变了过去的重点所在,改变了有关过去的知识构成,改变了分析的基本单元,也改变了个体与整体互动的方式。明治日本有一种充实民族国家主体的坚定愿望。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对许多系科进行了改组,创建了历史学系,从而实现了这种强制愿望在现代日本的制度化。历史学科的建立,是东大内外围绕过去的内涵和过去应当如何被结构化而多年争论的结果。这场争论的最大输家是曾经帮助创立日本第一个历史协会——“史学会”的小中村清矩和内藤耻叟。作为新系科首批教授之一的久米邦武,这样总结当时流行的历史观:“历史是把握一国之经历的东西。除了那些无知之地外,所有国家都拥有历

^① 参看 Thomas Keirstead, “Inventing Medieval Japan: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 1 (1998): 47—71.

史。一个仅有文学而无历史的国家就如同一个富裕却没有谱牒的家庭。”^①

在 19 世纪 90 年代进行编年史修撰中,“生产的强制性”迅速增加。久米与重野继续评估着材料,把那些不再符合新历史标准的重要人物彻底抹去。重野因为他的辛勤劳作而获得了“抹杀博士”的外号,久米则对《古事记》中神话部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同时那珂通世(1851—1908)重新编订了时间表,其他学者则致力于搜寻邪马台国及那位女萨满或女皇卑弥呼——两者都载于中国史书——的种种线索,以寻找日本的起源^②。这些努力的结果——虽然从没有完全实现——便是把死亡过去重新编排到日本的历史中去。

这段转换仍然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我们对日本及其历史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古典时间之上。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新的时间形式,或者说历史本身,改变(降低、同质化、限制)了经验的诸可能性。它对“人们是什么”进行了界定。我们都听说过类似“日本人是……”这样的表述,在它的谓语中填充着大概应归入近代的各种文化特点。这里,观念融入了实体,但却存在一个重要的倒置。实体本身是因“日本人”这一抽象范畴而成立的;实体只是为观念提供了经验证据,而非决定了这一范畴。在 21 世纪,我们需要问,这种强加于语言与经验之间的统一性,在今天是否仍然合适(我并未肯定它曾经合适过,但它已经成了一个常识)^③。

编年史:时间的不在场证据

18 世纪的进步观念(二战以后它以现代化理论的学术形式被翻新和制度化)提供了运动、进步和发展的可能性和摆脱过去的自由。这是进步与发展的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这条依线性变化观念而成的秩序,内含着一系列经常带来问题的过程。Michel de Certeau 写道:

经过对事件的生物分类式的重排,编年史成为一种毫无反思地使用时间的方式,成了时间的不在场证据。……在这个成就颇丰的过程中,时间仍然是被感知的;只是,时间一方面从内部转化成了理性行动的序列、另一方面从外部客观化为一个编年史单元的度量体系,因此感知只

① 久米邦武:《修史意見書》,收入田中彰、宫地正人编《歴史認識》(东京:岩波书店,1991 年),第 227 页。

② 对有关卑弥呼与邪马台国的争论,参看拙著 *Japan's Ori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特别是第四章。

③ Harootunian 在 *Things Seen and Unse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一书中,把德川时代后期描述为语言与经验之间日益增长的冲突。这让我印象深刻,并以为对当今同样适用。

剩下一种语言：一种表达生产的强制性的道德语言。^①

编年史已经成为我们理解时间和历史的固有观念；确实，少了它，我们甚至很难去想象过去。这一过程被投射到线性时间上，似乎它就是从一个静止的、更加自然的（或者从时间上来说原初的）状态，走向永远会更加美好的未来（现代）。更进一步，编年史自身的弹性也大大强化了其外在的自然性。国际之间的同步化，也可以在国内出现：许多独立的部分（地区或共同体）被统合进了一套等级化的整体中（民族—国家）。它还扭曲了我们对教育的关注：一个人越是接近这种规范就越为文明。那些对新情况有所质疑或接受较慢的人，就会被贴上保守、落伍、封建、幼稚等等之类的标签。这是“尚未够格（not yet）”的某种国内变异^②。

此外，de Certeau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编年史时间是否限制、乃至阻碍了我们理解变化的能力；经验和（我想要补充的）分析已然存在于生产过程本身之内。仅仅通过线性时间的生产过程来感知时间，其种种局限也令 Thomas Carlyle 感到困扰，他在 1830 年写道：“过去的那些事情并不构成一个系列，而是一个集群……每个单独的事件都不是另外某一个事件的产物，而是所有此前或同时发生的其他事件的产物；同时反过来，这一事件也会与其他事件一起孕育出新的事件：这就是永生、永动之‘存在的混沌（Chaos of Being）’。”^③这种生产的强制性，既是资本主义（效率和利润）和科学、技术（更多、更大、更快、永无止尽）的标志，也是当今历史与区域研究之学术世界的核心。然而，正如 Carlyle 所指出的，任何研究过诸前近代或非近代社会的人都知道，过去既不是线性的，也不能和现在截然分开。传统的知识会通过行为、传说、社会、习俗和写作等等之中传承下来。多种时间形式曾经共存：包括（1884 年被采用的）普遍时间、当地时间、离散时间、年鉴、宗教时间，等等。

毫无反思地使用时间，要求时间和历史都外在于人类社会。David Harvey 概括 Whitehead 的观点，描述了抽象时间的实际影响：“绝对时空的理论，迫使我们采用一种例如机械性的叙事框架，使我们无法观察世界的一些（如同

① Michel de Certeau, "History: Ethics, Science, and Fiction," in Norma Naan, et al, eds. *Social Science as Moral Inqui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45.

②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译者注：Chakrabarty 所提出的“not yet”的典型例子，是 John Stuart Mill 一方面论证人民统治的代议制政府是最高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尚未文明到可以施行此种政府形式的程度。

③ "On History," in *Historical Essays*, ed. by Chris R. Vanden Bossc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5.